

黄遵宪《日本国志》研究

郑海麟著

暨南大学



暨南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

黄遵宪《日本国志》研究

院 系： 文学院历史系

专 业： 中外关系史

研究方向： 中日关系史

研 究 生： 郑 海 麟

导 师： 朱杰勤教授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一日

内 容 提 要

黄遵宪(字公度, 1848—1905, 广东嘉应人。清末举人, 曾充出使日本、英国参赞, 美国旧金山, 新加坡总领事)是生在内忧外患的我国近代社会的一位先进人物。他在驻日使馆参赞任内着手编纂的《日本国志》, 是近代中国人第一部综合性地研究日本的巨著, 它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近现代人的日本研究和戊戌变法史研究的著作中, 提到《日本国志》的不少, 但总的来讲, 研究得还远远不够具体, 深入和全面。因此, 笔者认为, 对这部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过一定影响的著作, 有必要作进一步的系统研究。

如果将《日本国志》作具体的剖析, 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

- 一、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
- 二、介绍日本明治维新, 反映著者的改革思想。
- 三、中日关系史研究。
- 四、介绍日本的民俗文化。

本论力求对《日本国志》的史学思想, 变法维新的改革观念, 以及这些思想观念对清末维新运动产生的影响, 进行较全面的考察并作出评价。同时, 对《日本国志》涉及中日关系史和日本民俗文化史的内容, 也进行了较具体的分析与评价。

结论认为:《日本国志》的史学思想, 在继承我国传统史学思想的同时, 能以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进化史观看待历史发展, 因而在清末由封建史学向资产阶级史学的转变过程中, 起到承先启后的

创辟作用。

《日本国志》表现出改革思想，尽管还带有早期改良主义思想的痕迹，但它的基本思想已跨越了早期改良主义思想的朦胧阶段，明确地要求用资产阶级立宪制取代封建君主专制，形成了一套仿效日本以变法新理论，这些理论直接影响了戊戌变法运动及康有为等人。

《日本国志》《邻交志》从中日关系史的角度，对秦汉以来两千年的中日两国通交往来作了有系统的研究介绍，为近百年来中日关系史研究开启道路。《礼俗志》则从民俗文化史的角度，向中国人展示了日本民族的丰富的民俗文化内容，加深了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

总之，《日本国志》作为近代中国人研究日本的第一部集大成著作，无论从中国人研究日本的角度，抑或从近代思想史的角度，都有其值得充分肯定价值和作用。

目 录

内容提要

- 一、黄遵宪以前中国人对日本的研究
- 二、《日本国志》的写作动机及其特点
- 三、《日本国志》的史学思想及其方法
- 四、《日本国志》的政治思想
- 五、《日本国志》的经济思想
- 六、《日本国志》的军事与文教改革观念
- 七、《日本国志》对戊戌变法的影响
- 八、关于《邻交志》
- 九、从民俗学看《礼俗志》
- 十、结束语

暨南大学图书馆存

郑海麟

Synopsis

Huang Tsun-hsin (kung-tu, 1848-1905), born in Chiaying of Kwangtung, was a scholar of the late-ching Dynasty. As a counsellor to Japan and Britain, a consul general to San Francisco and Singapore, he was a progressive figure in the disturbing years of modern China. "History of Japan" Huang compiled in his tenure of counsellor in Japan was the first complete studies done by Chinese, and the book also exercised a certain influence in Chinese modern history. Many modern works relevant to studies of Japan and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have made references of "History of Japan", but, as a whole, the research work is far from enough and further studies are greatly needed.

"History of Japan" generally consists of 4 parts:

- (i) The ideas and methodology in history
- (ii)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Japanese Reform Movement of 1868 and the reflection of the author's reform thinkings.
- (iii)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Sino-Japan relationship.
- (iv) The introduction of Japanese cultures and customs.

The dissertations aim at the revolutionary thinkings of historicism and the Japanese reform

• | •

movement which has influenced the Chines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about which the dissertations offer comparatively a complete study and comment as well as stage a careful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Sino-Japanese^{se} relationship and on Japanese cultures and customs.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historical, ideas in "History of Japan"-- inheriting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Thinkings at the same time treating historic development from the viewpoint of Western bourgeois thinkings and evolutionism--consequently functioned innovatively and successively in the turning process from feudalistic historicism towards bourgeois historicism.

The revolutionary ideas, revealed in "History of Japan" having the impact on early reformism though, fundamentally, jumps over the unmaturing period of early reformism and clearly demands the feudalistic monarchy be replaced by the bourgeois constitution. These theories had the direct effect upon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and Kang Yuowei and other reformists.

From the point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hip, "History of Japan" and "History of Neighboring Nations" offer a systematic research on more-than-2000-year Sino-Japanese contacts since Chin and Han Dynasties, and the two books open a path to the study of the modern history of Sino-Japan relationship.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Practices and Customs" shows richness in Japanese cultural customs which have enhanced Chinese understandings towards Japan.

After all, "History of Japan", the first complete work for those Chinese studying Japan, is conformed in its positive function and great value-- either viewed from studies of Japan done by the Chinese or viewed from the modern history of thinking.

一、黄遵宪以前中国人对日本的研究

中国学人对外国研究肇始得很早，纪元前司马迁所撰《史记》就辟有《大宛传》，记述当时中国以外的异国事情，内容涉及由中亚到西亚，远及伊朗等各国；关于中外交通的还有《匈奴传》、《张骞传》等，记述了汉朝与当时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国家交通往来关系。《史记》一书，不仅博通古今，而且沟通中外。因此，朱杰勤先生称它是一部“以中国为主体的世界史”。①太史公“网罗天下旧闻，不遗闕”^②的治史观点，为历代史家取法，《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皆辟有^专传叙述外国事情。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两国人民之间的通交往来就很频繁。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大陆上的人民就曾^曾过朝鲜半岛（古代的辰韩一带），沿着日本海向左流动的海环流路这条航线，来往于日本的山阴、北陆一带，从而将中国的文化传到日本。③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日本出土的二千年前的铜铎和三角缘神兽镜，这些盛行于古代日本的器物，考古学家认为其制作技术显然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刻有魏晋朝代年号的三角缘神兽镜，见于日本而不见于中国，因此考古学家推断它们是东渡的中国工匠在日本制作的。④

中日两国人民在生产技术方面的交流，必然会使学人注意在东邻日本的存在。《山海经·卷十二·海内北经》便提到古代日本国的大致方位：“盖国在~~于~~燕南，倭北，倭属燕。”⑤这是属一种推测，但后来经出土文物的佐证，表明其大致方向是正确的。⑥东汉

班固撰《汉书》亦提到：“东瀛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⑥王充在《论衡》中亦多次提到当时“倭人贡畅”⑦之事，虽然畅草经后人考定为广西郁林产物，不产于日本列岛，对《论衡》中的“倭”是否同于《山海经》、《汉书》中的“倭”提出疑问。但以上所引史料足于证明，中国学人不但注意到海外倭人的存在，而且开始搜集有关这方面的资料。

中国人最早有关日本研究的文字，应推陈寿撰《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这篇有关古代日本社会的文献，是目前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全面地记载公元二世纪前后日本列岛的地理位置、交通里程、政治制度、风俗人情以及生产、经济等各方面情况的珍贵资料。如该传在叙述古代日本列岛与中国的通交关系说：“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又如记述当时列岛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邪马台国说：“南至邪马台国，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陆行一月，官有伊支马，次曰弥马升，次曰弥弥鞬支，次曰奴佳鞮，可七万余户……自女王国以北，特置一六率，檢察诸国，诸国畏慎之。常治伊都国，于国中有如刺史。”

《魏志·倭人传》显然是吸收了《汉书》及与陈寿同时代或稍早的鱼豢所撰《魏略》中有关倭事的记载。⑧但这篇一千九百多字的文献，无论从内容和篇幅上皆远远超越前人，成为草创期的中国人日本研究的一座里程碑。在中日关系史以及日本古代史的研究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⑨

如果我们将《魏志·倭人传》作为中国人的日本研究之滥觞，从而往下探索，将会发现，一至至隋唐，历朝正史中有关倭事的记

载，大抵都以《魏志·倭人传》为底本，然后增补一些当时所闻所见到内容，如成书要比《魏志》晚一百五十年即《后汉书·倭国传》，其内容许多就是承袭《魏志·倭人传》的，不过《后汉书》从中亦补充了一些为《魏志》所无的重要史实。如“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这段文字，在中日关系史的研究方面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文中提到光武帝所授的金印，于日本天明四年（1784年）在福冈县志贺岛出土。黄遵宪在日本时曾亲见此印（印文曰：“汉委奴国王”）并于所著《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邻交志》中提到它。

除以上提到的两传，往下有《晋书·倭人传》、《宋书·倭国传》、《南齐书·倭国传》、《梁书·倭传》，这四传中除《宋书·倭国传》记述了高祖永初二年（421年）诏书日本至顺章升明二年（478年）日本遣使上表，要求诏除武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这段中日关系，从而给我们研究当时的中日关系史提供了新材料外，其余三传没给我们提供特别有价值的史料。

总之，由《魏志·倭人传》至《梁书·倭传》，这段时期中国人有关日本的研究，基本上都是来自传闻，即其史料来源一般是靠来“朝贡”的日本使者或来往于中日两国间的工匠、商人的口述。这些以传闻为依据的“倭”传，是中国人研究日本的第一阶段的特征。

到了隋唐，由于日本遣隋使、遣唐使的大量来华和中国亦时有遣使回访，以及高僧的浮海东渡传教、两国间商人贸易额的扩大，

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通交往来之频繁，加深了彼此间的相互了解。这段时期中国人对日本研究亦有了很大程度上的发展。周魏征等撰《隋书·食货传》，虽然还有不少篇幅承袭了《魏志》的记述，但所增补的有关圣德太子于推古十一年（603年）制定的十二阶冠位，^⑩以及所制定的日本宪法十七条的内容，^⑪这些反映日本当时政治制度改革的记述，无疑是借自遣唐使的报告。后晋刘昫所修《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五·日本传》，记述了日本经大化革新后“颇有文字，修敬佛法”以及百姓易服饰之事。而宋祁、欧阳修撰《新唐书·日本传》，记述了由日本封建时代的史学家们所伪造的初代系谱中的第一代元祖天御宇主神至皇极天皇共三十六世天皇的名号。这些天皇名号的列举，便是来自入宋僧裔然提供的日本史料（《王年代记》）写成的。

及至元朝脱脱所撰《宋史·日本传》，基本上是采用日本入宋僧裔然提供的资料编撰的。该传中提到裔然入宋时“献铜器十余事，并本国《职员令》、《王年代记》各一卷。”传中还记下了与裔然“笔谈”了解到的有关日本的文化、物产、气候、地理、政治等情况。特别关于日本地理疆域，有“诸五畿、七道、三岛凡三千七百七十二郡。”这些地理名称和数字，直到清末还有人沿用。另外，在接受宋太宗的召见时，裔然还向太宗介绍日本“国王一系传继”的万世一系的恩德。传中所记由初武天皇到守平天皇（圆融天皇）凡六十四世天皇的名号，亦是根据裔然提供的《王年代记》而编录的。《宋史·日本传》中还记述了不少有关中日商人往来和物产交换的情况。该传涉及内容很多，范围亦颇广，可以说无论从深度和广度方面，都大大超越了以往中国人对日本研究。

从《隋书·食国传》到《宋史·日本传》，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中国人研究日本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由前一阶段的传闻性过渡到直接采用日本史料作为研究的前提，其可信程度亦大为增加。另外，值得着重提出的是由《旧唐书》开始，改“倭”为“日本”，及至修《宋史》时，作者不再把《日本传》归列于夷蛮传或四夷传中，而将它放在《外国传》中，这种由称谓到体例上的改变，实即“显示出中国人对日本观念的改变。”^⑫当然，中国人的日本观念的改变，是由于日本列岛自大化革新（645年）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增长造成的。

从整部中日关系史上来看，元、明两朝为交恶时多、通好时少的时期。元朝遣师倭日，最后以失败告终。《元史·日本传》基本上都是有关两国使臣往返及交战的记录。但即便在同样充满火药味的年代里，日本入元僧犹可称得上络绎不绝，就是在《元史·日本传》中，亦还留下了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遣僧人宇一山前往日本的记录。^⑬

明代，由于倭寇之患，中国人的日本研究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高峰期。不仅官方所修《明史·日本传》详细记载了倭患情况，而且还出现了大量的民间研究日本的书。如薛俊《日本考略》、郑若曾《日本图纂》、《筹海图编》、李言恭、郝杰《日本考》、郑舜功《日本一瞥》等。^⑭这些日本研究之书，主要目的是为防倭抗倭而作，可称作为适应当时形势需要的经世之书。然而，当时中国人为了达到了解日本这一知己知彼的战略目的，对日本的研究确实是花了大量功夫去收集资料，考订史实，以及实地稽查。这就大大地突破了唐宋人靠耳闻或与入唐僧“笔谈”等半属传闻，半属纪实向日

本研究。也即是从以往无目的或是目的不明确时编修《日本传》到有目的且目的很明确（防倭抗倭）地研究日本。如集当时中国人日本研究之大成的《筹海图编》十三卷，便有《日本国图》、《倭国入贡事略》、《倭国事略》、《王官使倭事略》等有关中日关系与日本研究的内容，它“详尽地记录了当时时倭情和明朝朝野在抗倭剿寇方面的主张、意见”，⑤《筹海图编》值得珍视的原因就在于此。因而，无论后来修《明史》者或研究日本的书，大多皆参考或节引述该书。

明代中国人的日本研究的重要标志是由以往两个时期的官方正史记载为主，转入到民间专门性研究为主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日本研究的特点是：（1）具有很明显的目的性（防倭抗倭）。（2）所据资料力求翔实，重于耳目经见而避免传闻之辞。（3）研究对象具体化和专门化，如明代日本研究书目《日本考略》创“寄语”就是一例，往后其余诸书几乎都辟有“寄语”一栏。（4）有自己的见解，不象以往日本研究的著作只是转录他人所述作为材料。因此，明代中国人的日本研究无论从广抑或深方面皆要比唐宋人高得多。

明末，日本德川家康于1603年在江户（今东京）建立德川幕府。德川氏吸取了丰臣秀吉对外征战造成民、国敝之患的教训，因而放弃了对外侵略政策。以后，倭患亦为之缓纾。同时，幕府为防止欧洲资本主义势力的东渐，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下令禁止日本商人出海贸易。只准许中国、荷兰两国商人可在指定的长崎港与日本商人进行交易。另一方面，中国在明亡后，清政府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和担心抗清势力内外联络，因而下令禁海，有“片板不准下海”之禁令。于是，中日两国正常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几乎陷于

停顿，中国人的日本研究显得异常萧条。

清初只有少数到过长崎的商人和文人，通过与日本人的接触了解一些日本情况，因而写过几本游记，见闻录，由于局限在长崎一隅，见闻狭隘，这些书所记日本事皆极为简略，^⑩而且错误百出，如比较有代表性的《海国闻见录》（陈伦炯撰），《南海篇》（汪启淑撰）等书亦在所不免。

清平翁广平（1760—1843）于嘉庆19年（1814）撰有《吾妻镜补》三十卷。全书分为世系表、地理志、风土志、食货志、通商条约、职官志、艺文志、图书、虚语解、兵事、附属国志、杂记等部分。该书体例类似中国史书年谱“志”，因此一名《日本重志》，与袁遵宪书为同名之作。《吾妻镜补》引用中日图书一百八十多种，可谓旁征博引的一部日本研究巨著，^⑪但作者足迹未出国门，这种“闭门造车”之作，难免抄袭讹传之误。且成书后未见刊刻，流传不广。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为抵抗外来侵略，在引进西方现代武器（师夷之长技制夷）的同时，亦积极研究外国的情况。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和魏源所《海国图志》相继问世。《瀛环志略》卷一即“亚细亚”中列有“东洋二国”。记载日本与琉球，并附有日本、琉球地图，其中记日本有云：“日本古称倭奴，其国在东海中，平列三大岛，北曰对马岛，与高丽南境相直，一夜可达……中曰长崎；土狭长，与浙海普陀山相直，内地商船互市于此，南曰萨摩马，与浙之温台相直。人强悍，刀垦利，兼产马。”^⑫这段文字完全节自陈伦炯《海国闻见录》，把日本三岛称为对马、长崎、萨摩马，并且还用地图标出，当然是大错特错，足见闭关时代中国

人的世界地理知识之贫乏。不过，即便被日本人称为“标志着中国建立起洋学的划时代的成就”^{①②}的《海国图志》；其中对日本的了解亦不比徐继畲的《瀛环志略》进步多少。百卷本《海国图志》中，卷十七为《日本岛国录》，所述日本事皆为摘引前人书编排而成。所引之书有《明史·日本传》、茅元仪《武备志》、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南怀仁《坤舆图说》、顾亭林《天下郡国利病书》、徐继畲《瀛环志略》等书。由于作者未出重门，对所述日本事未作过调查研究，因此在转引他人之书时未免人云亦云，且所据资料大都较为陈旧之说。可以说徐、魏对日本的研究并没有超越前人的范围。

继徐、魏之后，由于清朝“海禁”已开，赴日的文人学士逐渐多了起来。他们将耳目经见有关日本的情形结集成册。如龚棠的《日本考略》、傅云龙的《日本沿革》、《日本疆域险要》、陈其元郎《日本近事记》、王韬的《日本通国考》、《扶桑游记》、何如璋的《使东述略》、《使东杂咏》、王之春郎《东游日记》、《东洋琐记》等^{①③}。这些日记、游记、见闻录所述日本事大都零碎、缺乏系统研究，不过大多是经实地考察耳目所见传来，因而所述情形基本上是可靠的。

总的说来，由明末到黄遵宪以前，这一阶段中国人的日本研究是零后的，其成果无论从深度或广度来说皆不如明代。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压卷中概述了以上四个阶段中国人日本研究的大致情况，同时阐明自己为什么要发奋撰述《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的原因：

“《山海经》已述倭国事，而历代史志，于舆地风土，十不一真。

专书惟有《筹海图编》，然所述萨摩事，亦影响耳。（《明史·艺文志》有李言恭《日本考》五卷、侯继高《日本风土记》四卷，书皆不存于世。余从友人处假有《风土记》钞本，不著撰人，未审是侯本否？书极陋，不足观。唐人以下，送日本僧诗至多，曾不及风俗。日本旧已有史，因海禁严，中土不得著于录。惟朱竹垞收《吾妻镜》一部，故不能详，士大夫足迹不至其地，至者又不读其书，谬悠无怪也。宋~~濂~~秦有《日本曲》十首，《昭代丛书》有沙起云《日本杂咏》十六首。宋诗自言问之海东僧，僧不能答，亦可知矣。起云诗仅言长崎民风，文又甚陋。至尤西堂《外国竹枝词》，日本止二首，然述丰太閤事，已谬不可言。日本与我仅隔衣带水，仅述我事，积屋充栋；而我所记载彼，第以供一~~谈~~余甚惜之。今从大吏后，得其大要，草《日本志》成四十卷；复举杂事，以国势、天文、地理、政治、文学、风俗、服饰、技艺、物产为次，衍为小注，串之以诗。余虽不文，然考于书，征于士大夫，误则又改，故非同壁揣摩之谭也。第不通方言，终虑多谬，愿后来者订正之耳。”

概括地说，黄遵宪以前中国人对日本的研究，无论正史或是私人专著、笔记、见闻录等，皆存在着目的性不明确或缺乏实地考察因而错漏百出的毛病，即使如《筹海图编》这样较有价值的日本研究专著，所述日本事大都出自传闻。其它日本研究之书，亦只是一些有关日本事情的零星介绍。就是近代到过日本的一些中国人写的见闻录、日记等，也只对日本作了些走马观花式的介绍，且停留于表面。总地说来，这些日本研究的书水平都不高，有些甚至称不上“研究”。这样，要改变中国人日本研究的落后状况，就需要编纂

一部深入地、系统地、全面准确地介绍日本^的著作。作为清朝第一^任驻日使馆参赞黄遵宪，积极地承担了这一艰巨的任务，他发奋研究日本，决心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编纂}一部综合性地介绍日本^的著作，以填补清代以来日本研究之不足。

注 释

① 朱杰勤《对于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的管见》，《海交史研究》1986年第1期。

②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1—3页。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③ 王仲殊《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载《考古》1981年第四期。

④ 《山海经校注》第321页。袁珂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版。

⑤ 日本备后御调郡三原町及备前邑九郡山手村，皆发现先秦时代的货币“明刀”，据专家考定，“明刀”为燕国物，且自辽东以至朝鲜半岛的西海岸各地区，如平安北道，平安南道，全罗南道等，皆有同样的“明刀”出现，更可断定燕国等与日本^的交通路线，是经由辽东、朝鲜两部沿海地区，以至日本。于是，《山海经》所说的“倭属燕”，便不再是无稽之谈了。（参见李则芬《中日关系史》第39页。台湾中华书局版。1970年）

⑥ 《汉书》卷28下《地理志·燕地》。